

丰润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丰润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六月

目 录

丰润县早期职业教育发展概况	朱友春 (1)
缪锡久与“永茂汽车行”	张福生 (8)
晚清著名画家赵国华事略	张国才、孙长田整理 (15)
起义将领刘海波从事黄埔军校工作纪实	
	孟恒昌 (25)
潘家峪惨案	
	——转自《河北惨案史料选编二》 (46)
附：歌曲《潘家峪大联唱》	王树义搜集整理 (66)
铮铮铁骨晶晶玉	
	——忆抗日战争中坚贞不屈的张明玉等烈士
	杨泽生整理 (75)
奋起抗敌寇，截击给养车	刘作民 (80)
我国著名摄影艺术家——张印泉	张树保 (83)
魏如凤与魏家戏班	郑文卿 (86)
情深谊厚常相思	
	——记著名评剧演员魏荣元
	郑文卿 (90)
唐山地区著名皮影艺人——苏旭	郝秀庭 (98)
丰润县天主教的沿革和宗教生活	王光枢整理 (102)
黄花港圣母院的修女生活	王光枢整理 (115)
威武壮观的南青坨古戏楼	孔德明 (122)
无梁阁考	张 平 (124)
天宫寺塔史话	董宝莹 (128)
曹家坝	张德福 (140)

丰润县早期职业教育发展概况

朱友春

我县职业教育起步较早，在戊戌维新的影响下，我县有识之士就致力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工作。当时主县政者（即县长）为芦木斋。芦积极主持并筹办经济学堂，购置新书，以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培养人才。经济学堂虽毁于八国侵略军，但其影响还是巨大的。我县的工艺局就是在此影响下应运而生的。

工艺局

工艺局是官办的。是实行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试验场。初办的工艺局规模不大，教育的比重也小，生产时间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教学时间仅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这就是说，学员除从事本专业的生产外，还学习些技术课和文化课，这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而采取的措施。学生一边生产，一边学习，生产收入的钱除供给学员的伙食外，余下的作为学校经费使用。因此说，工艺局是我县职业教育的嚆矢。经过艰苦创业，工艺局从仅有的几台织布机（铁轮机），发展成既有织毛巾机又有织袜机等比较先进的半手工机器，遂给以后我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创立了良好的开端。

商业学校与售品所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新政”还是逐步实施。废除了科举制度，书院也随之停办。在原浚阳书院旧址开办了工艺局。工艺局规模小，占不了整个书院，于是在工艺局同院又成立了商业学校。工艺局和商业学校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均为李秋野先生。李公自日本留学回县后，积极提倡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他对我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包括职业教育及一般中小学教育）作出了较大贡献。商业学校学生除用一部分时间修文化课外，其余时间学商业课，计有商业簿记、商业道德、商业实践、商事要项以及珠算等科目。商业学校的成立使我县职业教育向前迈了一大步。为了销售工艺局的产品，并使商业学校的学生得有实习的机会，还成立了售品所。所谓实习，只是在售品所参观，帮帮摊，观摩如何操作（如用尺、整理商品、处理帐目、计算方法等），并不能把全部销售工作包下来，特别是实习学生对待顾客决不允许置喙。后来，售品所除了销售工艺局的产品以外，还经营外厂外地的产品，从单元走向多元，逐渐向商店方向发展。此时售品所与商业学校分开，失掉当初成立的意义，就不得不进行改革了。

丰润县立职业学校

二十年代初，我县对职业教育做了一次改革，把商业学校和工艺局合并，命名为丰润县立职业学校，成为四年制的旧制中学。这一改革，使我县职业教育有了新的发展。

改组后的职业学校分工科商科两部分。工科注重化学（由于印染的需要）、机械、制图（由于机织的需要）等课

程。为了配合教学，以工厂为实习场地。教学设备除原工艺局的织布机、织毛巾机、织袜机外，还添置了提花机。提花机在当时还是比较先进的手工机械。在织的方面，学生对制图、打孔、穿结、上机等各道工序都要一一实习。教师在课堂讲授后，又和技师在实习车间指导实践。在染的方面，也是如此，如配料、调色、染色都是先通过讲授、再去亲手操作，这样学的知识就不是空洞的了。

工科办了三个班。当时的教师有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秦老师，有经验丰富的王甫腾技师（即王志坚同志，解放后任丰满文教局长）和一个姓郑的技师。这时生产的成品有限，因为学校办学的指导思想是研究技术，提高质量，培养人才，对经济效益比较忽视，这是它的特点，也是它的弱点。因此，给以后的经费不足留下了致命伤。

商科共办了十个班，其中八、九、十班，是四年制中学。一至七班是继承原商业学校的班序。商业学校的办学宗旨是培养一般商店、工厂的会计和管理人员，改组后的八、九、十班是在前七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培养目标转为银行、海关、铁路的从业人员。当时银行等单位业务都使用英文，所以，学校特别重视英语。每周的英语课除读本文法外，还有尺牍、作文、几何、代数，也都是英文版本。读本有《模范读本》、《英文津逮》、《伊索寓言》、《天方夜谭》及《莎士比亚本事》等。文法有中学英文法及英文典大全等。教英文和英文尺牍课的教师是张旭初（北京燕京大学毕业），教几何代数的老师是张静岚（燕京大学毕业），吴乙臣（天津北洋大学毕业）。专业课逐年增添的有银行簿记、银行新论、经济学、会计学、仓库学、货币学、保险学及广告学等。专业课的教师是王芝屏（法商学院毕业）和工

竹泉等。打字机课由王芝屏老师指导，学校只有一台英文打字机，实习时只好分成三人一组，分组轮流实习。其他科教师有刘星奎（法政大学毕业，教学法概论及地理），肖一峰（教体育及生理卫生），朱伯荣（教历史，抗日战争时期去解放区任山西某县教育科长）等，教国文的教师有刘秩升（解放后曾任唐山市文教局副局长），谷荷亭（前清秀才），甯竹忱，李竹遗，王燮元，这些教师或留学东洋或游洋水或为宿儒饱学或已蜚声桑梓，有的教古文，有的教现代文，均为当时教育界知名之士。历任校长有崔德孚、葛荣阶、马鸣章（离开职业学校即去绥棱县任县长）、王牲（最后一任校长）等。教师队伍比较精悍。

这校有一特点，是助学金和奖学金相结合的制度。每次期末考试，学生成绩（包括学习成绩和操行成绩）都要张榜公布，名列甲等的，下学期每月可得助学金1.5银元；名列乙等的，每月可得1元；名列丙等的，每月可得0.5元；名列丁等的无助学金。此外，校长随时突击抽考，择优给奖，办法是上课后五至十分钟内，教师刚开始讲课，校长突然走进课堂，暂停讲授，出题考试，（有的是带来自己刻印试卷，有时是带来试题自己写在黑板上），考试完毕，校长把卷带走，教师继续讲课。如果是带来试卷时答卷时间比较长些，但考试也不超过一节课，如果学生到点不能交卷，不能影响下节课，当堂要把试卷收走，其试题分量是经过考虑的，即中等程度的学生是能答完的。校长收卷后，一天内就公布成绩（最迟两天），前三名有奖，其奖值约在一个月助学金之数。并将成绩交该科老师登入记分册内。为了了解教学进度和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在抽考前校长频频听课，这时，教师和学生就意识到要抽考了，自然都要加意准备。有时真

的抽试了，有时则不然，这种有计划又突然，而又虚虚实实的抽考方法，能达到调动教师和学生的教学和学习积极性的目的。不过这也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校长要内行。以马鸣章校长来说，他抽考数学英语时多，而抽考专业课的时候少，就是因为他长于英语和数学的缘故。

工科实习有车间，商科实习也有阵地。原来的售品所已不能适应需要，早已停办，因此又设置了合作社。合作社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实习，不是为了盈利。在老师的监督指导下，学生轮流到合作社实习，把全部业务都包下来。学生按课堂上所学的记帐方法，使用簿记传票记帐，日清周结，每星期交换一次。到学期末再公布总结表报，如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俨然一个新式小商店。

然而，这样一所生机勃勃的职业学校，一九三一年暑假后却突然停办了。商九班已毕业，商十班和工科班并入车中，各高小附设的职业班也缩减了。据称是经费不足的原因，这是次要的，其实，主要原因还是认识问题，是轻视职业教育的结果。

各重点高小附设的职业班

一九三一年以前，各重点高小都附设有职业班。其目的不只是为了给职业学校开辟生源，也是为了学生毕业后可以自谋生计。职业班的课程除高小的一般课程外，另设有珠算、简易记帐法、应用文等。学制可能较一般高小增加一年，但各校也不完全一致。当时没有法定的规章制度可循，完全由各校校长和教育局临时商定。我县的重点高小除六区——北东（城关小学）、北西（七树庄小学）、中东（韩城小学）、中西（小张各庄小学）、南东（宋家营小学）、

南西（官庄小学）外，又增加丰台、河头、唐山数处。这些重点学校大都设有职业班。以后在轻视职业教育的影响下，多数缩减，唯有河头学校却有发展，用这丝丝一缕延续着连绵不绝的职业教育的生命。

河头镇立商业职业学校

河头镇原有河头镇公立小学附设职业班，经费由县里拨给，商会资助一部。随着交通逐步发达，商业日趋繁荣，高小附设的职业班，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遂议另建了一处商业职业学校，简称商职，是半公立性质。其经费县里只补助一小部分，大部分由河头镇商会筹措。因此，其管理权也就操在河头商会手中，校长由商会聘任，由县里加委。该校校长对教职员的聘请和解聘只是在县里备一下案而已。校址把原小学扩建，校长由原小学校长调任，仍兼原小学校长。课程以中学课本为主，以专业商科课为辅，教职员在原有小学教职员的基础上，又招聘了一些，这样，这个学校很快发展起来，遂在轻视职业教育的洪流中，而起中流砥柱作用。校长董天锡在河头小学任校长多年，甚孚众望，与河头商会以及各大商号相处甚好。后来兼掌两校，把商职办的有声有色，成绩斐然，在社会上享有盛誉。抗日战争时期，丰润一分为二划为丰润、丰南两县，这个学校遂与丰润脱离关系。

农业职业学校

我县职业学校，除了工科即是商科，从未办过农科。这次农业职业学校设立，是在避开被轻视的商科，难办的工科，而在简师的废墟上设立的。日本鬼子侵入丰润县城以后，把简师校址作为驻地，致使简师颠沛流离，时办时停，最后

瓦解。抗日战争末期，经过一番酝酿，农业职业学校便兴建起来了。没有校址，暂设在铺房，当时商店纷纷倒闭，空店房比比皆是。农职的校址在一处，宿舍在一处。校长及教职员还是原简师班子。课程是把师范专业课改为农业课，把简师的破烂家俱及遭踏剩下的教学设备收集一起，边开学，边修整。解放战争时期，环境非常艰苦，伪县长被我军逐出县城后，还做垂死挣扎，有时溜回县城。这样，县城经历了解放——敌占——解放的反复过程，各校都不能开学，农职也就结束了。

结 语

我县职业教育自戊戌至解放前夕，中经多次战争及对职业教育认识的变化，有发展，有挫折，但毕竟培养造就了不少人才。由于他所具有中等教育文化水平，因而容易接受革命思想，而成长为革命干部，可忆起的有王金贵（商八班学生，化名彭莱，曾任唐山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杨荫槐（商八班学生，即杨植三，曾任唐山市卫生局副局长）、刘锡静（商九班学生，化名江汉，抗日时期曾任丰玉宁联合县长），等等，他们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到解放后，从事文教、工商、农业等项工作的亦不乏人。总之，在教育不发达的时代，各职业学校既培养了职业科技人才，又起到了一般中学教育作用。当前，我们国家把职业教育与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相提并论，作为改革教育结构的重要内容，实在是适时的、必要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缪锡九与“永茂汽车行”

张福生

自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汽车传入中国之后，在京东地区出现的第一家（也是规模最大的）汽车运输行业是“永茂汽车行”。“永茂汽车行”的创始人叫缪锡九。缪锡九的原籍就在丰润县车轴山村。

缪锡九，别名连盛，生于一九〇一年十月十九日。他的家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大地主家庭，拥有土地十四顷，房屋一百二十八间，平时雇长工二十多名，农忙时另雇短工七、八十名。

缪锡九弟兄六人，他排行第四。大哥缪于寿（连生）是恶霸地主，解放前曾任老庄子镇伪镇长、伙会大队长，一九五一年被人民政府镇压。二哥缪贯一（连元），一九二六年就到北京办起“永固”汽车行，是中国最早的汽车资本家之一。六弟缪连玉，解放后在天津开办华北联营社，经营喷雾器和杀虫药粉等。

缪锡九八岁（一九〇九年）上学，高小未毕业就退学在家务农。一九二三年，二十二岁的缪锡九因受其在北京“永固”汽车行当经理的二哥缪贯一的影响，不甘心在农村度日，总想开汽车，搞工业，做大买卖。于是，经二哥介绍，去张家口一家汽车行学开汽车。两年后出师，基本掌握了驾驶和修理当时流行的几种型号的进口汽车技术。

一九二五年，二十四岁的缪锡九离开张家口，来到了北京，在他二哥的“永固”汽车行当汽车司机。“永固”汽车行的地址在北京西四牌楼兵马司。当时，“永固”汽车行仅有三辆汽车，缪锡九每天往返于北京至密云或北京至唐山公路，运送旅客和货物，直到一九三〇年，他的技术已比较成熟，同时又看到开汽车行是一个既能挣大钱、又有发展前景的买卖，于是，他征得二哥的同意和大力支持，用自己几年来所挣的一部分工资，廉价从二哥手里买下一部“道济”牌汽车，于一九三〇年十月，由北京开到唐山，自成一体，在冀东办起了第一个汽车行——“永茂”汽车行。“永茂”汽车行设在唐山市平安东街，缪锡九任经理。因第一年只有这一辆汽车，缪锡九亲自开车，只配备一名助手，一切客货业务，都由他一人操办。到一九三一年，又买了一辆“万国”牌汽车，雇了三名工人。因这两辆汽车都是旧车，“道济”的水箱在行车途中经常开锅，故大家给它起个绰号叫“茶锅”。“万国”牌汽车因当时无驾驶室，雨天和暑天需要助手为司机打伞，大家给它起个绰号叫“旱伞”。车辆虽破旧，但由于所雇用的司机和助手都精心驾驶，又都善于维修，所以，基本上能正常出车，特别是当时汽车运输业尚属新生事物，唐山地区独此一家，唐山至丰润、唐山至胥各庄、唐山至玉田、唐山至遵化、唐山至滦县等路随便跑车，无人与之竞争，生意非常兴隆，营业额不断扩大。到一九三五年又添了三辆“道济”，次年又购进一辆“法勾”、两辆“福特”。一九三六年前后，唐山地区铁路沿线各城镇经营汽车的组织逐渐增多，汽车行发展到十几家，有的是天津、北京大汽车行在唐驻车，有的是当地一些富商自购自干，大多只有一辆车。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永茂”汽车行在与刚刚兴起

的十几家汽车行的激烈竞争中，又购进“福特”车十二辆。至一九四〇年，“永茂”汽车行已具有相当规模，汽车四十余辆，拥有工人近二百人，除在唐山驻车二十七、八辆以外，还在天津驻汽车八辆，济南三辆，北京两辆。每辆汽车除司机外，货车配备助手两名，兼管装卸；客车配售票员一名。汽车行经理以下设主任一名，负责日常工作；会计三至四名，负责结算运费；业务人员三至四名，负责联系客货业务。另外还有专管加油人员一名，稽查人员二至三名，修理人员三、四名。在客运沿途各重要站点，还设有代办站，聘请专职或兼职人员代卖客票。

货运的主要路线是唐山至周围各县及开平、古冶、赵各庄三矿。运输物资为海产品、煤炭、棉花、花生等。客运路线除唐山至邻近的丰润、胥各庄、滦县外，还有玉田、林南仓、遵化、薊县、乐亭、迁安等地，而且还直达天津和北京。当时的客票价，折合现在的人民币，大致数额如下：唐山至任各庄八角，任各庄至丰润六角，唐山至丰润一元二角；丰润至沙流河九角，唐山至沙流河二元；沙流河至玉田九角，唐山至玉田二元八角，玉田至燕山口三角，唐山至燕山口三元；燕山口至平安城五角，唐山至平安城三元三角；平安城至遵化一元，唐山至遵化三元五角。当时这些票价只是一个参考，由于道路遇到雨天或进入山区，行走困难，有时就随时涨价，有时，由于汽车行增多，互相竞争，又随时降价。

缪锡九经营的“永茂”汽车行之所以由小到大，发展迅速，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缪锡九本人懂技术，懂业务，经营得法。如在营运路线的选择、司机及管理人員的任用，重要客货业务的招揽以及汽车零部件的选购与修理等方面，他都亲自掌握，深谋远虑，精打细算，从不马虎从事。二是依

仗财大气粗，运用各种手段，交结地方和官方势力，以得到后台支柱。缪锡九出身于远近闻名的大地主家庭，弟兄及亲友中有的权势很大，特别是他在唐山开办了汽车行后，先后又结识了伪河北省第四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张荣记、伪三青团主任孙洪玉、伪43师师长刘耀以及熊飞、陈子政、罗国华等，又曾聘用日本领事馆小元银三做顾问，雇用美国在天津的美丰洋行的德国人“米洛”做司机，所以势力相当大。三是善于利用自己业务上的专长和依仗伪上层势力，与同行进行激烈地竞争。比如在日本进关前后，为了与弱小汽车行进行竞争，他借口与官方合作，承包了唐山至丰润、唐山至胥各庄、唐山至玉田等业务较好的路线，又买通出入唐山的各关卡，只允许挂“永茂”汽车牌子的汽车自由出入。这样，就迫使大多数汽车行要么停业，要么在名义上挂“永茂”汽车牌，向“永茂”缴纳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提成费。

尽管缪锡九懂业务，会经营，又有势力，但他的“永茂”汽车行却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刁难、控制、排挤以至扼杀。因为缪锡九的“永茂”汽车行毕竟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是中国的新型的资本主义企业，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是不愿意看到它的成长与壮大的。

一九三六年，日本帝国主义就以中日合资为名，在天津成立了“华北汽车公司”，在唐山和山海关设立了“民新”和“山建”两个分公司，在冀东地区与“永茂”等汽车行进行竞争。一九三九年四月被日本人直接控制的伪“华北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并接管了“华北汽车公司”，在冀东地区设立的唐山、秦皇岛、滦县三个营业所，属天津铁路局直接领导。“华交”成立后，对当时的民间运输组织更是明目

张胆地进行排挤，设置层层关卡，买车、买路，禁止民间运输车辆通行，使大多数私营汽车行营业萧条，经营困难，最终纷纷倒闭。就连财大气粗的“永茂”汽车行也不能与之抗衡。一九四二年，“华交”强行将“永茂”经营多年的唐山至丰润和唐山至河头这两条路况最好、生意最兴隆、利润最高的路线，连车带人一同“买”过去，并指令“永茂”的客车由唐山去林南仓不得经由玉田。这样，唐山一带的客运就基本上被“华交”垄断。“永茂”汽车行只得忍气吞声地行驶路况艰难、旅客稀少的偏僻路线，惨淡经营，勉强维持。这还不算，在货运方面更是百般刁难。起初，指令“永茂”每月要到日本驻唐山领事馆领取“准运证”，无“准运证”不准搞运输；以后，每个星期就要去领取一次，最后竟要一天一领取，名义上是取证，实则是刁难、限制。由于进日本领事馆不容易，手续又这样繁杂，到一九四四年盛极一时的“永茂”汽车行只好卖掉一部分车辆，解雇大部分工人，关门停业，保留一些不愿走的技术骨干，长期管饭，不发工资，以图东山再起。直到日本投降以后，缪锡九才又重整旗鼓，带领保留下来的技术骨干，修整保存下来的六辆汽车，又招雇了一批工人，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重新恢复了唐山至丰润、河头、滦县、乐亭、玉田等地的客货运输。建国前夕的几年，又成了“永茂”汽车行的一个“黄金”时节，“永茂”汽车行的经理缪锡九，也已成了著名的资本家。这时他不但拥有冀东地区最大的汽车行，在北京也有了他的汽车行。而且几年的时间他又相继置买了很多房产。北京和老家的不算，只在唐山，平安东街一、二、三、四、五号都成了他的私有房产；胜利路有他三所计30间；“九美斋”楼房一所；在马家村前街等地还有他房产二所，总计他在唐山共有房院九所，

房屋七十四间。另外在北京，他还和白月亭等合资开办了大安化学厂；在天津，他六弟缪子玉开办的天津化学厂中，他也是股东之一。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唐山解放后，“永茂”汽车行最早恢复了客货运输。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后，又搞起由唐山至天津的客运，每个旅客全程票价银元三块，而且还在天津市内搞了一段时间的客运。

一九五二年七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唐山市内十几家私营汽车行组织起来，成立了互助组，这时的“永茂汽车行”已更名“永茂汽车公司”，在唐山有汽车六辆，仍是唐山最大的私营运输组织，缪锡九仍为经理。后来互助组成员发展到三十多户。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各车主以折价入股形式，将互助组改为唐山市第一个公私合营汽车队，队长白景哲、副队长赵西猷，唐山运输公司私管科副科长刘泽涵为公方代表，任指导员；“永茂”汽车公司经理缪锡九任董事会董事。当时从业人员84人（其中私方41人），地址由互助组所在的西马路迁到胜利路（现变压器厂院内）。一九五七年，缪锡九又被任命为公私合营汽车队副队长。一九五八年十月，公私合营汽车队与唐山市长途汽车站合并，缪锡九被任命为长途汽车站副站长。一九六三年底，缪锡九已六十二岁，因为健康原因，不得不申请退休，离开自己为之奋斗了四十年的交通运输业。退休时，他的工资每月70元，汽车利息每月210元，另有出租房屋64间，每月得房租100余元。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缪锡九同全国很多民族资本家一样，受到了残酷迫害，一九六七年初被停发劳保工资，并被遣送回原籍——丰润县车轴山村。一九七三年，初步落实政策恢复劳保待遇。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病逝，终年

七十四岁。

缪锡九一生从事交通运输事业。解放前，为了个人发家致富，为了在汽车运输方面干出一番事业，他不畏艰险，勇于开创，为了“永茂”汽车行的生存与发展，他既与反动势力进行了勾结，又与之进行周旋和斗争；既千方百计地赚取了工人們的剩余价值，又在客观上为中华民族的汽车运输事业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解放后，他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任职期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成了自食其力的新人。总之，缪锡九及其“永茂”汽车行在冀东以至中华民族的汽车运输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晚清古文名家赵国华传略

张国才 孙长田整理

赵国华，字菁衫，河北省丰润县大王庄人。生于一八三八年（清道光十八年），卒于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享年五十七岁。

赵国华为咸丰八年举人，同治二年进士。自同治二年至光绪二十年的三十年间，除在三十九岁至四十一岁家居二年外，均在山东省的郛城、泰安、德州、沂州等地任知县、知州、知府，署理文案总办（类省秘书长）、全省书局总办、通志局总办、山东省兵备道员、按察使、乡试同考官、济东泰武临道员、山东省盐运使等职。诰授资政大夫二品顶带，赏戴花翎。

赵国华在山东历仕期间，为人正直，不避权贵，不徇私情，在勋业上跋古人而不徒。其天资非凡，聪颖过人，尤以古文出名，故有“南桐城，北丰润”之称^①。

年幼好学 聪颖过人

国华一岁父亲病故，由其母李氏抚养成人。其母贤慧，知书达礼，在国华三岁时就教其认字读书。国华好学善问，四岁那年，其母将《柏庐家训》挂在墙壁上，晨醒从枕授之，又教他唐诗五言绝句若干首。曾祖父见而喜之曰：强儿（国华的小名）能识字矣，即以手所持四书指认，国华见